

抗日英雄王天一

· 李翔宇 李晓娜



王天一,男,汉族,生于1887年,汝州市大峪镇龙王村王沟自然村人。他出身贫寒,以替人织布打工为生。因他对人义气豪爽,在大峪地区颇有声望。

1944年5月初,日本鬼子用飞机大炮,攻克临汝县城,临汝全境沦陷,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也伸向了大峪地区。大峪人民为了看家护院,纷纷建立起农民武装——“联庄社”。由于王天一敢作敢为,被大家推举为“联庄社”的小头目。

1944年9月底,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解放了大峪地区,在中共临汝地下党员和大峪地区进步人士郎占选、于培周等人的支持下,开辟以大峪店为中心的临汝抗日根据地,成立临汝县抗日政府和临汝抗日区政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中共临汝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峪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成立抗日救国会、妇救会、群众抗日武装。王天一在中共临汝县委书记、县长党峰、县委副书记张清杰等人的教育、劝说下,同意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将他领导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大峪抗日区政府基干民兵大队。王天一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政策,帮助抗日县政府、区政府发动群众,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在根据地开展的“反围剿”、“反‘扫荡’”和“倒地”及减租减息运动中,他舍生忘死,身先士卒,全力协助县、区政府抗击日伪的进犯,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峪区中队下辖四个中队,区长董逢甲兼任大队长,王天一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王天一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带领区中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县独立团,参加了上、下官寺战斗、孟窑狙击战、歼灭伪军孙长海部、击溃叛匪梁小舟的战斗,挫败了日伪武装的多次进攻,深得领导信任。他曾带领李贵和王大贵两个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大土匪头子黄万镛的老巢米庙镇黄庄村进行谈判,他不亢不卑、大义凛然,迫使黄万镛同意达成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协议。

1945年1月份的一天,盘踞在禹县的日本鬼子,夜间埋伏在大峪店的东山坡上,准备偷袭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第二天天刚亮,

有几个驮煤的群众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日本人来了,在东山上没有下来。听到这个消息,中共临汝县副书记、抗日县政府情报处长张清杰同志立即组织王天一、张玉林两个中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命令张玉林中队从大雄山南坡往东打,王天一中队在大峪店东面向东打,两面包抄日军。王天一中队所在的山头离日军三百米左右,中间隔着一道沟。太阳出来了,王天一发现日军都在山坡南崖上躺着晒太阳,就果断命令部下向敌人开枪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作一团。由于我军东西两面夹击,敌人不敢贸然向前进攻,两军相持了一天。天黄昏时,敌人趁着夜色灰溜溜地逃跑了。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几十名日本侵略者,我军没有伤亡。皮定均司令员事后专程从白栗坪赶到大峪店,对参战民兵进行表扬。

1945年3月2日,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党委、河南军区移驻大峪地区,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和司令部就驻扎在王天一家的窑洞内。王天一与王司令员形影不离,成了王司令员忠实的警卫员。王天一带领的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还打过几次仗。

盘踞在禹县上官寺、下官寺的惯匪席子猷,原为国民党禹县县长,日军侵占禹县后,摇身一变,成为日伪禹县维持会会长兼自卫团团长,有匪众2000多人。大峪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席匪秉承其日主子旨的旨意,多次向根据地进犯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1945年2月上旬一天,席匪中队长李良安,带200余名匪徒,打着区中队王天一中队的旗号,偷袭大峪东沟、高崖头一带,占领根据地内的东沟、高崖头、栗坎、魏沟、姚沟、南沟、斗嘴、大坪8个村庄。敌人在这些村内,枪杀了农民郭长水、李福林、李狗旦3人,烧死农民郭书信,还将一个3岁的小孩郭合扔进水潭淹死。烧毁民房76间,奸污妇女5人,拉走群众(肉票)13人,抢劫群众财产,抢走牛、羊等不计其数。

面对顽匪席子猷的多次袭扰,当时正在大峪地区的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副政委刘子久,同一支区司令员皮定均决定攻打上、下官寺,狠狠打击席子猷。王天一及其部下,对敌人冒充自己的队伍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个个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要求到前线去,配合主力部队,彻底打垮席子猷的反动势力,还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这次战斗由王树声司令员亲自指挥,一支队皮定均部和四支队张才干部为主力,地方武装搞增援,民兵与人民群众支前,以上官寺为攻打重点,全面展开围剿席子猷匪军的战斗。王天一和几个地方中队

都参加了战斗。

战斗从1945年农历2月19日开始,这天晚上下着大雨,部队摸黑前进,迂回到上官寺一带,把敌人的外围据点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另外,为阻击敌人援兵,临汝县独立团分兵把口,王天一中队埋伏官山、马王寨一带;秦光善中队埋伏范门、赵庄一带;另一支中队埋伏在田黄山一带,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

战斗打响后,当晚就攻开了下官寺周围的6个村子。皮定均司令员带部队主攻席子猷的指挥部范门村。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八路军战士用水沾棉被、毛毡裹住身子向前推进(俗称土坦克),部队跟随其后,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终于攻克范门寨,席子猷在战斗中从地道逃跑。第二天部队乘胜攻打上官寺,在炮火的掩护下,我一鼓作气,攻克上官寺,歼灭了守寨的大部匪兵。然后集中全力,重兵包围上官寺,向敌人发动总攻,经过两次攻坚,在强大炮火的压力下,敌人死伤惨重,顽匪李清现带残匪百余人逃跑,我军攻克上官寺。这次战斗,从农历2月19日开始到25日,历时6天,歼敌2000余人,彻底打垮了顽匪席子猷。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同年农历九月初一,王树声领导部队通过整编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主动撤离大峪根据地。王天一与大峪200多名基干民兵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家乡,告别亲人,跟随八路军大部南下大别山,与新四军李先念部汇合。后因王天一一年近六旬,经部队领导批准,与班庄村的袁聚德一起离开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跋涉,回到了家乡。

王天一回到家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黄万镛那里。黄万镛指使特务组织秘密逮捕王天一。伪保长颜狮子的警卫员王树臣,与王天一过去共过事,他很敬佩王天一的人,不忍心王天一被害,秘密地把消息传给王天一。王天一得到消息后,晚上不敢住在家里,经常东躲西藏,以防不测。

一天晚上,他和侄儿王水旺睡在家北土坡上的打麦场里,半夜时分,村里的狗突然狂叫起来,王天一发现情况不对,连衣服都来不及穿,掂起衣服就跑。敌人拼命地追赶,王天一抓了把土向敌人的脸上撒去,因敌人的眼被迷住,他才有幸逃脱。敌人没有抓住王天一,对他的老婆孩子进行了疯狂的殴打、辱骂,只有五六岁的儿子王宽水,被吓

得哇哇大哭,敌人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头部,恶狠狠地说“再哭,打死你!”吓得孩子不敢哭出声来。敌人临走时,把王天一家的财物洗劫一空,家里刚卖的一头猪钱也被抢走,仅有的一匹布被敌人缠在腰里带走了。

还有一次,王天一在杨窑村碗沟自然村给一家人织布,听别人说保队长带着王沟去了,王天一一听情况不妙,立即撂下活儿逃跑了。敌人赶到王沟他家抓人,找不着王天一。敌人通过欺骗的手段,得知王天一在碗沟给一家织布后,就气汹汹地赶到碗沟村。见不着王天一,敌人恼羞成怒,把这家主人打了一顿,把织布机给砸了。

由于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王天一只好把两个小女儿寄住在亲戚家,带着妻子、儿子和侄儿,背井离乡,逃到登封境内的白栗坪一带,东躲西藏,艰难度日。直到1948年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九纵七十五团,兵分三路,彻底打垮了盘踞在大峪西部袁窑村的梁家地主武装,大峪地区获得了彻底解放。王天一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家乡,与广大翻身农民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忘大峪老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于1951年9月6日至25日,派出中央北方抗日根据地访问团河南分团许昌分队临汝组对大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访问。访问团到大峪店后,建立了访问工作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烈属属、模范座谈会,乡村干部会、区乡农代会等各种会议,对老根据地的地理环境、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沦陷后人民遭受摧残的情况、解放后的发展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听取了根据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选举出参加区域代表会的代表69名。并选举王天一、王金柱、秦广善三名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在许昌召开的豫西老区代表大会。

王天一同志由一个地方武装的小头目,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下,逐步成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大峪抗日根据地有影响力的抗日英雄,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遭到了国民党临汝县地方反动势力的追捕和迫害。由于当时兵荒马乱,他离开部队时,部队领导出具的返乡证明也不幸遗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不公平待遇。直到1971年7月,他因病去世,他的待遇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合理解决。但他无怨无悔,一直务农,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本文根据2018年3月26日与王天一的一子王水旺、儿子王宽水的座谈纪录及有关史料整理而成)

平语近人

——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

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什么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21日)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这项工作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

目前,北方一些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冬季大量采用分散燃煤取暖,污染物排放量巨大,是北方地区冬季雾霾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雾霾严重城市地区采暖清洁化。

要研究制定清洁取暖的总体规划,对适宜于集中供暖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偏远的中小城市、小城镇,主要通过分布式清洁供暖的方式替代燃煤取暖。要放开供暖、能源生产和使用等方面准入限制,建立有利于清洁供暖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清洁供暖领域。要通过免稅降费和电网让利等方式,通过电力体制和电力价格改革,把电价降下来。通过加强配电网建设,减免过网费、发电企业和供暖用户直接交易等方式,使弃风、弃光严重的地区将风电、光电直接用于供暖。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清洁供暖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煤改气要多方开拓气源,提高管道输送能力,在落实气源的前提下有规划地推进,防止出现气荒。要支持规模化养殖企业和专业化企业生产沼气、生物天然气,促进秸秆沼气化,更多用于农村清洁取暖。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21日)

梅花绽放春意浓



3月5日,随着气温回暖,洗耳河道路旁的梅花绚丽绽放,粉红色的花朵在枝头迎风摇曳,花香四溢,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春意。 张亚萍 摄

汝州非遗项目——汝州曲剧

汝州曲剧是在河南民间“小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起初的形式是表演者边踩高跷边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鼓子曲是一种曲牌联缀体的说唱艺术,演唱时,三五人自执檀板击节,一反以前的三弦伴奏形式,需要帮腔处就一起帮腔。每一曲目,均按一定的曲牌顺序来演唱。

大约在民国初年,出现鼓子曲与踩高跷相结合的形式,称为“高跷曲”。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既不化装,也不分行当,只是由数人踩高跷唱有故事情节的曲子,以三弦等乐器伴奏,走街串坊。1920年前后,出现了有简单化装和粗略的行当分工的高跷曲,多数鼓子曲中有人物故事的民间传说脚本,如《小姑贤》《打皂》《小打鱼》等。

“高跷曲”去掉高跷拐子并登上戏剧舞台,是一般的民间歌舞演变为正式的“高台曲”这种

戏曲形式的标志性事件,形成曲剧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老汝州的曲剧——地道货”这句在汝州城乡广为流传的俗语,道出了汝州人对曲剧的自豪和挚爱。“经济发展是血肉,文化建设是灵魂”,我市戏曲历史源远流长,自1926年5月18日曲剧被杨楼镇郑铁村朱万明等搬上舞台至今已经有94年的历史。2016年“汝州曲剧”被河南省文化厅公布为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崔占、杜书安、范兰英、朱海、张太雷、王凤霞、李建政、樊桃红、李芳东、韩志国、孙艳艳、董永军、韩建章等。

作为曲剧发源地,近年来,我市积极寻找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的契机,持续加大戏曲活动开展的范围和频率,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推动曲剧艺术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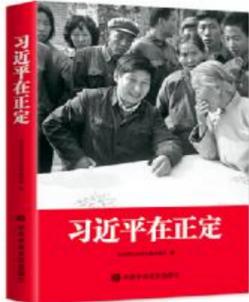
(刚鑫雨 杜宏伟)

汝州·非遗



曲剧爱好者在排练节目(资料图)

·连载·



我说:“确实她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了,这次我们带她到医院输液,她还是自己开门下车的。但到了医院,当天晚上就突发脑血栓,没抢救过来。”

他听后长叹一声:“唉!可惜了,太可惜了。”后来,他还在纪念吕玉兰的那篇

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恒,挥泪忆深情。”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吕玉兰这一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吕玉兰的深深怀念之情。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也很熟悉,请您谈一谈您本人与他的交往和联系的故事。

江山:好的。吕玉兰跟习近平同志是好朋友、好同事,所以这么多年,我跟习近平同志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吕玉兰去世后,我就开始采访、收集资料,撰写她的传记。我把这件事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他在电话上说:“好,太好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吕玉兰同志是很优秀的劳动模范,也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

我整理吕玉兰的书信时,发现1983年她在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同志给她写过信。信里面大致的内容是:玉兰同志,

你在农大上学,学习顺利不顺利?最近正定的工作一直比较忙,我也没有抽出时间给你汇报,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你就说话。

在信的后半部分,习近平同志把县里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简单讲了讲。这封信写得很诚恳,既有交流的意思,也有问候的意思。

写完吕玉兰的传记以后,我把打印稿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一份。他看完以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江山同志,你的书稿我看了,总的感觉很好,关于正定那一段也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改动,同意出版。”书出版以后,我又专门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两本,给他留作纪念。

我是2006年退休的。退休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反而在退休以后,却和他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我退休后

开始搞“红色旅游”,需要找他做一个“红色旅游”主题的采访。我写好采访提纲,交给他的秘书,很快他就答应了采访。我在杭州采访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习近平同志透彻地谈了浙江省如何认识红色旅游,如何领导、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谈得很好。后来,新华社内参采用了这篇采访稿。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篇采访稿的内容很多网站也有了转载。

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正定,乃至后来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我采访过习近平同志,也采访过很多领导同志,我就从一名记者的角度谈一谈他的特点: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

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恳诚恳。

“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这个栋梁之材,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采访对象:何载,1919年生于甘肃成县,祖籍陕西宝鸡,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1979年起,任中组部干部局局长、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15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采访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

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了解一下。(未完待续)